

永恒的
经典



一世珍藏的 70 篇 名家随笔

YINGDE
MINGJIASUIPI

毕
军
编

在这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里，还有一群像闪烁的美丽星星一般的优秀的小作品，它们零星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像繁星也分布在广阔的夜空中。比起那些宏伟的著作，它们虽然只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但正是这点点的光亮让文学世界变得更加美丽而充实。它们就是随笔。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的恩惠

[法国]波德莱尔

月——她是浮动的本身——当你睡在你的摇篮里的时候，从窗门窥望进来，说：“这孩子很中我意。”

她软步走下了云的梯子，毫无声息地穿过窗门的玻璃。于是她带了母亲的柔软的温和，俯伏在你的上面，将她的颜色留在你的脸上。因此你的瞳仁成为碧绿，你的两颊异常的青白。因此你看着这来访者的时候，你的眼这样意外地张大了；她又这样柔和地用两臂来拥抱你的颈子，所以你以后便永远易于落泪了。

当她完全沉浸在喜悦里，月充满了全屋，正如一种有磷光的空气，正如一种明亮的毒。这一切的活的光辉在思索而且说：“你将永远地爱我的亲吻的影响。你将美，如我之美；你将爱一切，如我所爱的，与我所被爱的。水与云；夜与沉默；广大的绿海；无形与多形的水；你永不会到的地方；你永不会知道的情人；怪异的花；酩酊的香气；昏眩似的躺在风琴上用甜美如女人一般沙声啜泣的猫！

而且你将为爱我者所爱，为媚我者所媚。你将为他们的女王——有碧眼的，他们的颈子在夜的爱抚里被我所拥抱的，那些爱海，爱广大的狂暴的碧海，无形与多形的水，他们不到的土地，他们不知道的女人，犹如不知教仪的焚香者的邪香的花，乱人意志的香味，以及为他们自己愚行之象征的凶野而放纵的野兽的人们的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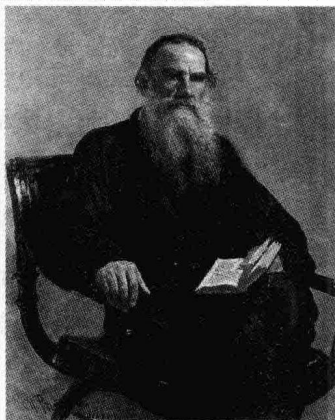
便为这缘故，被诅而且被爱的娇养的孩子，我所以睡在你的脚下，想在你那里寻到那可畏的女神的影像。——那前知的神母与一切的“月光病者”的毒的乳母。



论生活

[俄罗斯]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尔斯泰这个贵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几部被视作经典的长篇小说，而他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要写下来的是——

（一）习惯是伟大的。习惯使得以前无论何时都需要许多努力——精神的要素和动物的要素相斗争——的各种行为，不再需要那些努力和注意，而让它们能够使用到后来的工作上面去。习惯是凝固基石的石灰，它使得在基石上面能够加上新的石块。可是，这种习惯的善的性能，当斗争的解决对动物的要素有利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不道德的原因。即发生了人吃人、执行死刑、进行战争、私有土地、利用卖淫等等的事情。

（二）不错，信心、迷信、妄想，都给人生以巨大的力量。然而，在这种场合，为了实行人人生一切法则，就得制定重要的、唯一的、而且大部分可能的形式和方法，比如教会法则的实行、去势、自焚、无信仰者的绝灭等

所有这一切仿佛只是很糟糕，不多也不少，如果一位把这一切描绘下来的作家没有把能破坏鄙俗行为宁静的一句尖锐的话抛出去的话。没有这句话便仿佛没什么可揭露的，一切依然如故。

问题却在于，在这篇老的短篇小说（写于1899年的《小天使》）中已经响起一种音调，它使“现实主义者”安德烈耶夫不幸地与“该死的”颓废派互相接近。这是丧失理智的音调，它直接源自鄙俗行为和蜘蛛的平静。除此之外，这是透过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响起的音调，是只在19世纪末才变得异常痛苦和尖利的音调，因而也就听得更为清晰。音调里透出极度的悲观失望，因为音调里表现出作家们和政论家们对立的原因，反映出作家对自己和世界丧失理智所感到的恐惧，而这一音调恰恰长期还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他们为了自己死板的神圣不可侵犯，把这音调拖得老长，并且不想知道，当它猝然中止时将会有有什么。将会有不祥的平静，呆滞的目光，死亡，精神失常和悲观绝望。

这一音调可以在安德烈耶夫短篇小说的一句话中听到。他叙述道，当主人的孩子们在等待枞树晚会之间用软木塞互相射击对方鼻子的时候，小姑娘们笑着，把双手贴在胸前，弯下了身子。这是个多么平常、多么小的细节，似乎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在这句话中却听到了一种只能形象地解释的恐惧。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图景：画面上只有一个摆出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的半大姑娘。它弯下身子，这就是说，她的脸呈三角形，头冲下；她笑着；就是说她那笑眯眯地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下面出现了几道与脸庞不相称的皱纹，好似年轻人的眼睛旁有几道老年人那样的皱纹；而她把双手贴在胸前，好似用它们轻轻托住薄纱，薄纱下是不很清晰的、已非少女的胴体。这很像斯维德利加依洛夫关于手持花束的小姑娘的梦，像弗鲁别利笔下那些苍白的脸呈三角形的疯女人肖像。但这却是同样一只黏乎乎的母蜘蛛在编织淫欲的蜘蛛网。

我不必去杜撰和发展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姿态的内涵。也许，作家本人感觉到了这一内涵，尽管是无意识的。值得回忆的，是他的所有短篇小说都燃烧着理智丧失的火焰；其实，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他以天才的渐进和自

里相逢，恍若是在另一个世界上。”

瞧我们三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于战争的头几天（1914年8月5日）在皇村车站用午餐（古米廖夫已经穿上士兵制服）。当时勃洛克奔走于应征入伍者的家庭里，为了给他们以帮助。当我们剩下两人时，科利亚说：

“难道也要派他上前线？要知道这同烤夜莺是一样的啊！”

四分之一世纪后，还是在那座剧院里，举行了纪念勃洛克的晚会（1940年），我朗诵了我刚创作的诗篇：

他是对的——又是路灯，药箱，
涅瓦河，沉寂无声，花岗岩……
像座世纪之初纪念碑，
斯人在那里伫立——
当他向普希金之家
挥几下手告别之时，
他收下了死神的倦意，
一如接受不应得的安谧。

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还不知道这部长诗，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克雷索洛夫》。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50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在天上阅读我的作品，我也不会更为惊奇。在我对您20余年的崇拜中，我不仅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而且还事先剔除了这一可能，如今，它改变了我关于自己的生命及其过程的认识。生命的弧线及其终端在一年年地散开，似乎永远不该聚合，可是突然，在眨眼的瞬间，它紧紧接合在我的眼前。在何时！在最不合适的一天之最不合适的一刻！

院子里，2月末不太暗的、饶舌的黄昏已然来临。一生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您，是一个人，我可以给您写信，您在我的存在中将发挥巨大的非人工的作用。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如今它突然降临在我的意识中。我很快便给您写了信。

我如今也许很怕再看到那封我已不记得的信。对您说您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世上最轻松不过的事。但是，如果我谈起自己，亦即谈起我们的时代，那我就未必能处理好那尚不成熟的主题。

我未必能恰当地向您叙述所有革命中永远是头几天的那些日子，那里，德穆兰们会跳上桌子，用为空气干杯来激奋路人。我是这些日子的见证人。现实就像一个私生女，半裸着身子逃出牢房，将彻头彻尾地不合法、无嫁妆的整个自我，凌驾于合法历史之上。我看到大地上的夏天，这个夏天似乎认不出自我了，它是自然的，走在历史前面的，似是走向新的发现。我留下了一本描写这个夏天的书。在书中，我表达出了有助于了解这场最不同寻常、最难以捉摸的革命的一切。

她朝墙壁稍稍转过身去，重又抬起自己那只操劳过度的大手划了一个小小的十字——她已经没有力气把十字划得大些：

“主啊，救救你的奴仆玛丽娅和你的红色首都莫斯科吧……”

突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仿佛火红的朝霞一样在我心中慢慢升起。

“瞧，她是怎么死的：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又是告别，又是祝福……她就是这样投入战争的，她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劳动。这不是死亡，这是最后的事业。遵照俄罗斯风俗慢慢死去，确切地说，慢慢离去，视死如归，心里明明白白。对她来说问题不在上帝，完全不在上帝。据说巴甫洛夫死的时候，一直注视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断向坐在身边的助手口授自己的感觉。突然有人敲门，想来看他，但他回答：

‘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在死亡。’人类的天才和我愚昧的奶奶……为什么她是愚昧的？难道勤劳，爱，无限的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想着亲人，想着祖国，不是精神最纯洁的高峰？是的，天才巴甫洛夫和我奶奶在弥留之际的心态一模一样——没有丝毫恐惧，始终想着生活，并且为了生活不遗余力地去完成最后的事业……这绝不是死亡，这是挑战……是向降临在我们头上，在我们周围疯狂肆虐的死神挑战。这是战士的死亡。难道我们不也是这样死亡的吗？我们，所有遭受炮击、在隆隆作响的云层里作战的人们？是的！不顾死亡，仅仅想着生活。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就是说，死亡并不存在，丝毫不用对它害怕。难道这是真的，死亡并不存在？”

我心潮起伏，万千思绪大致就是这样一浪推着一浪汹涌向前。我情不自禁地从奶奶越来越凉的掌心中抽出手来，看了看表。“我得去单位，然后再去区委，去电台……”她明白我的手势，就像大人朝做错了事情的孩子那样亲切而又略带宽厚地微微一笑。

“去吧，莉列奇卡，”她温柔地说：“去吧，亲爱的，别等……我啦……”

“奶奶，请你原谅，”我回答，仿佛不是和她永别，仿佛明天我还会来看她，“我真的该走了，这你知道……”

“我全知道，我的孙女儿，我的孩子，去吧……去吧！”

己另有一个超乎一切的生活，他的话不能损坏我们于毫发的，或者……。但是那时节我们只觉得不好不这么大笑一声，所以才笑，实在也没有闲暇去仔细分析自己了。当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缠着，正要向人细诉，那时我们平时尊敬的人却用个极无聊的理由（甚至于最卑鄙的）来解释我们这穿过心灵的悲哀。看到这深深一层的隔膜，我们除开无聊赖的破涕为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有时候我们倒霉起来，整天从早到晚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到晚上疲累非常，懊恼万分，悔也不是，哭也不是，也只好咽下眼泪，空心地笑着。我们一生忙碌，把不可再得的光阴消磨在马蹄铁轮，以及无谓敷衍之间，整天打算，可是自己不晓得为甚这么费心机，为了要活着用尽苦心来延长这寿命，却又不觉得或者到底有何好处，自己并没有享受生活过，总之黑漆一团活着。夜阑人静，回头一想，哪能够不吃吃地笑，笑时感到无限的生的悲哀。就说我们淡于生死了，对于现世界的厌烦同人事的憎恶还会像毒蛇般蜿蜒走到面前，缠着身上。我们真可说倦于一切，可惜我们也没有爱恋上死神，觉得也不值得花那么大劲去求死，在此不生不死心境里，只见伤感重重来袭，偶然挣些力气，来叹几口气，叹完气也免不了失笑，那笑是多么酸苦的。这几种笑声发自我们的口里，自己听到，心中生个不可言喻的恐怖，或者又引起另一个鬼似的狞笑。若使是由他人口里传出，只要我们探讨出他们的源泉，我们也会惺惺惜惺惺而心酸，同时害怕地全身打战。此外失望人的傻笑，下头人挨了骂对于主子的陪笑，趾高气扬的热官对于贫贱故交的冷笑，老处女在她们结婚席上所呈的干笑，生离永别时节的苦笑——这些笑全是“自然”跟我们为难，把我们弄得没有办法，我们承认失败了的表现是我们心灵的堡垒下面刺目的降幡。莎士比亚的妙句“对着悲哀的微笑”

（smiling at grief）说尽此中的苦况。拜伦在他的杰作Don Juan《唐璜》里有二句：

“Of all tales 'tis the saddest—and more sad. Because it makes us smile.”

（在所有故事中它是最可悲——而且还要可悲，因为它让我们微笑。）

这两句是我愁闷无聊时所喜欢反复吟诵的，因为真能传出“笑”的悲剧情调。

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为生活是可留恋的，过去的春天的日子，所

一提农村，首先就想到城市。这一带就位在东京附近，恐怕这是一般思路的顺序吧。与大阪和京都的农村相比，东京的农村简直是尚未开发。而且显得额外贫瘠。不过，伊豆的生活还比较好过。这里没有像关东农村常见的那种荒芜、凋敝的景象。姑娘们似乎对“去东京，去东京”的憧憬也不太强烈。也很少有人离乡到他处干女工的活计。这里温泉星罗棋布，到这里来的东京人相当的多，然而这里受到他们的影响却意外的少。稍漂亮的城市女子一到来，旅馆的女佣就会马上说：“这是位好人哩。”这句话蕴含着非常纯真的韵味。这是很好的印象。

我眼下下榻的汤岛温泉，是个小小的村庄。有两三户以男人为对象的女人人家。当然，她们不是当地女子。然而，村妇和村姑娘同这样的女子谈话很有意思。例如，下雨天一个女子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跑进一家点心铺，拍了拍前来购物的村姑娘的肩膀，姑娘报以着实美好的微笑。于是双方就地站着，若无其事地闲聊了起来。坐在走廊上袒胸给孩子喂奶的村妇，也同蹲在她面前的一个奇怪的女人若无其事地谈天说地，谈个没完没了。今年冬上，不知为什么，许多卖糖果的朝鲜人来了，在村庄里租房的几乎都是卖糖果的人。身穿白裙的朝鲜妇女在小河边上洗衣裳。村妇并肩站在街道对面的房子里，向穿着白裙的女人学上几句朝鲜话，那确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前些日子，在吉奈温泉收听广播的时候，狗儿冲着收音机尖声狂吠。我觉得与农家的狗儿不同。村妇的那种若无其事地接受事物的方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近闻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女人渐渐趋向不讲情操了。从各地农村妇女的角度来看，东京妇女仍然过分地受到贞操观念的束缚，这恐怕是当然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东京妇女无论品行好的或是品行差的，都带上一些不自然的造作。而农村妇女即使品行明显地差或是明显的好，看起来都是很自然的。伊豆有些地方，如海边的渔村和码头，还有往南一些的地方也是很讲贞操的。恐怕只能说这地方的待人接物是很讲礼貌的。就以著名的温泉来说，伊东和长冈是值得游乐的地方，而修善寺就不然了。

目前这一带插秧刚好结束，前些时候我每天都去观看插秧，深感意外

的，是没有听见插秧歌。一个新闻记者曾经告诉过我：这地方生活比较充裕，很少刺激，因而恋爱的要求也不强烈。的确可以说，生活情调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农村呆久了，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不变化的环境”，是不断地支配人们命运的环境的力量。我详尽地了解了她们的身世，大都是旅馆的女佣。环境及其命运就像一根长线，明显地映入我的眼帘。像我这样一个来去无踪的人，夸张点说，是这样一个天涯的孤客，会有什么称得上是环境的呢？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想到姑娘们的事，心情就有点迷惘，犹如站在黄昏笼罩下的山上。

还有一件事，就是妇女说，“久经世故”了。这旅馆来了个农村小姑娘给人家照料小孩子。不到一个月工夫，给旅馆当女佣的人便说是久经世故，然后就请假了。一般女佣，话儿稍一认真，就说自己“久经世故、久经世故”的。从未经世面的农村姑娘，也说自己久经世故而反省自躬。把自己久经世故或未经世面，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问题，这恐怕不仅限于农村姑娘吧。城市姑娘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曾想：一般女子“久经世故”是什么意思？对女子或对男子来说，纯粹具有什么意义？再说女子为什么认为这样的事是人生的大事呢？

伊豆是多山的半岛。山与海给人们提供了多半的生活食粮，这里不是农耕地，因此姑娘们就是山、海与田野之间的女儿吧。但在伊豆绝对没有美人。



远和近

[美国]沃尔夫

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小说家。生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期间即写剧本并演出，后在哈佛大学专学剧本写作；1926年开始写小说。沃尔夫短短的一生留下四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是《天使望故乡》（1929）。另外三部分别是《时间与河流》（1935）及死后出版的《罗网与磐石》（1939）和《你不能再回家》（1940）。他的作品虽以亲身经验为根据，但写得热情奔放，人物生动，颇有浪漫主义风格。



一个小镇，坐落在一个从铁路线连绵而来的高地上。它的郊外，有一座明净整洁装有绿色百叶窗的小屋。小屋一边，有一个园子，整齐地划成一块块，种着蔬菜。还有一架葡萄棚，到了八月底，葡萄就会成熟。屋前三棵大橡树，每到夏天，大片整齐的树荫，就会遮蔽这座小屋。另一边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坛。这一切，充满着整洁、繁盛、朴素的舒适气氛。

每天下午两点过几分，两个城市间的特快列车驶过这里。那时候，长长的列车要在镇上附近暂停一下，然后又平稳地起步前进，但是它的速度还没有开足时那么惊人。在机车有力的掣动下，眼看它不慌不忙地从容驶去，沉重的车厢压在铁轨上，发出低沉和谐的隆隆声，然后消失在弯道中。在一段

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巴黎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文明代表大会。

大会的召开迫在眉睫，但是启程却不容易。那时没有空中交通工具，不同于今天。必须从海上走。为了弄到船只，我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后找到一艘英国船，即“大不列颠女王号”。这艘船短期内将从加拿大魁北克港起航。

于是，我们开始了从墨西哥到那个城市的漫长的陆地旅行，途中在纽约休息了24小时。我们从魁北克乘船到达法国瑟堡港，然后乘火车到巴黎。聂鲁达已在车站上等候。他伸开双臂拥抱我们，同时用他那智利人的抱怨似的声调问了我一大堆关于古巴的问题。

聂鲁达负责邀请拉丁美洲作家参加会议的工作。他不但要欢迎和接待他们，而且要安排他们乘船去西班牙。所以，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他便赶来为我们办理进入西班牙国土的证件。虽然在人民阵线当政时期（最后它被布卢姆出卖了），手续办得仍然令人气愤和恼火。

在西班牙期间，我和聂鲁达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一块参加有关拉丁美洲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许多活动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后来，我们还曾在地球上一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地方：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等地多次重逢。在德国时，我们一起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像两位老爷爷一样主持了古巴和智利代表亲密地聚在一起举行的宴会。

我讲这些事情，是想证明我可以像谈论我的一位兄弟一样谈论聂鲁达。我不仅了解他的诗，而且也了解他的内心。聂鲁达总是用他的诗和身心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公开对抗贡萨雷斯·维德拉，反对巴蒂斯塔，以此支持他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他站在被投入巴西一座监狱里与世隔绝的普雷斯特斯一边。同样，现在他又站在今年的第46788号囚徒西克罗斯一边。

倘若当代某位诗人可以舒适地在他的祖国或美洲的其他地方为寡头统治服务的话，这样的诗人就是聂鲁达。他的诗引起的世界性的赞美，可以使他感到自命不凡，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拒绝接受有毒的、闪光的、骗人的花环，就像拒绝破坏性的有机物质一样。他维护我们美洲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事业和世界性的维护人的全部尊严的事业。作为诗人，他和

工人、士兵站在一起；他的言语是一种像优秀射手掌握的精良来复枪那么有效的武器。

所以今天晚上他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但不是为了攻击墨西哥，而是为了维护它，帮助它。这种维护和帮助就是为争取阿尔法罗·西克罗斯的获释而工作，就是揭露他遭到监禁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绝不能针对华雷斯和马德罗的人民。面对这种侵犯，我们可以重复一遍塔利兰德对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后者刚刚结束了枪杀博尔冯——孔代家族最后一个后代的工作。塔利兰德说：

“陛下，这样做比犯罪还糟；这是错误的。”

就是为了反对这种错误，聂鲁达才面对他的高尚的诗的。他的诗像烧灼器一样在有罪过的人肌肤上燃烧，像火焰一样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闪耀。

缪斯；我给了永恒的提尔泰奥斯们灵感；我教给雨果让《惩罚集》中的亚历山大们听刺耳的喇叭声和冒烟的大炮的隆隆声；我歌唱人民的斗争、暴君的倒台、自由人的伟大……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辱骂和仇恨。我扯下了陌生的手挂在帕斯基诺雕像基座上的大幅广告。你这部表现辱骂和轻蔑的作品就留在这儿吧，它不是我授意写的。你继续亵渎神圣的诗吧，把它变成伤人的箭、有毒的蛇、侮辱人的嘲讽吧，搅动妒忌的泥淖、抓起烂泥冒着弄脏自己的危险把它抛向空中吧；如果歌唱崇高的事物本可头戴光环的你，就积极地煽动沉睡的妒忌吧。我要去寻找热爱艺术和生活、热爱在幽暗森林深处微笑的大理石维纳斯、热爱在芳香的卧室里微笑的有血有肉的维纳斯、热爱大自然的歌声和音乐、热爱温柔的吻和艰苦的斗争、热爱多彩的丝织品和无情的利剑的诗人了。你永远不会感到我在你身边授意你写一节诗歌。你和你的憎恨和嘲弄的情绪留在这里吧！

肤色白皙、容貌妩媚的缪斯，口唇粉红、眼睛里反射着无垠的天空的缪斯，带着五月的黎明的透明光线和春天的芳香离开了房间。诗人孤独地留在那里，留在堆满一贯页书稿的桌边，失望地扫了一眼那堆金币和他那本讽刺诗集的书页，双手托着额头绝望地啜泣起来。



现实与想象

[秘鲁]马利亚特吉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5~1930），散文作家、进步的政治活动家、批评家。生于利马莫克瓜镇。童年被迫辍学，进报社当学徒工，自学成才，当过编辑、记者和作家。马利亚特吉对历史唯物主义颇有研究，并用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他的著作有《现代舞台》（1925）、《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1928）。后者是他的名著，其中阐述了印第安问题、土地问题、秘鲁的经济发展、宗教因素、地区主义与中央集权、文学过程、公共教育等。

在西方文学中，幻想又恢复了它的特权和地位。奥斯卡·王尔德成了当代美学大师。他目前享有的权威不是依凭他的作品，也不是依凭他的生平，而是由于他对事物和艺术的理解。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利于他的怪诞思想。王尔德断言，伦敦的大雾是绘画创造的。他说，不是艺术复制自然，而是自然复制艺术。在我们今天，马西莫·邦当佩利把这个观点推向了极端。根据邦当佩利的一种他从某个夏天在一个山村的思考中得来的奇特的理论，大地在形成之初，几乎完全是个矿物世界，那时只有人和石头。人以矿物为食。但是邦当佩利的想象力发现了大自然的另外两个王国。树木和动物是艺术家们想象出来的。人和植物在艺术中作为概念存在之后，开始真实地在大自然中存在。地球经过这样安排之后，人又创造了新的东西；机器出现了，机械文明诞生了。地球电气化了，机械化了。但是，在机械化达到了顶峰之后，发展过程又逆转了。矿物、植物、机器等等，重新归向了大自然。大地石化了，渐渐矿化了，直到返回它的原始状态。这样的演化进行了多次。今天，

在故乡的古老旋律的精神激励下，他也开始歌唱了。聂耳当时对音乐所知甚少，只会拉他的小提琴。但是他的富于人情味的歌曲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开来，比如《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渔光曲》。他的歌家喻户晓，无人不唱，想唱歌的人都喜欢他的歌。

但是，众人最爱唱的、聂耳出于对他一生最重要的问题的关心而作的歌，却是“起来！”这支歌表现了他对压迫者日本人的仇恨。他睁大噙着愤怒的泪水的眼睛高喊：“起来！如果跟我一样不愿做戴枷锁的奴隶！”……全中国的人在“起来！”的呐喊声中站起来了。当然，人民的背后也有叛徒。但是千百万、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高唱“起来！”最后连“勇敢的”蒋介石也认输了。感谢上帝。

不寻常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人袭击沿海大城市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就在那些城市里，后来遭到了破坏。但是“起来！”的歌声总是回荡在师生中间。决定把大学迁到敌人达不到的内地去。铁路和火车都被破坏，也没有汽车和足够的卡车，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只好用师生的双肩把书和仪器扛走。仅有几副临时绑的担架由哲学、医学和文学系的“脚夫”抬着，把最重的仪器运走。

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上所知道的最罕见、最奇特的撤退。课没有停止。当走到一座树林的荫凉里，当一天的疲劳一步步换来夜晚的安静，必定有一位教授讲老子，有一班学生分析莎士比亚。有时会有一只日本乌鸦在云端轰鸣，迅速冲下来，又立即逃走。因为那些撤退者，骨瘦如柴的撤退者，只能用孔子的教导和对日寇的蔑视来回答。大家面临的是死亡和死亡的考验。三个学法律的学生濒临死亡，他们是最勇敢的。学方言的葡萄牙小学生已经死去，化学教授也离开了他们。“起来！起来！”大家唱起来。聂耳的颂歌发自内心的，在挂着眼泪的嘴上爆发。在聂耳的歌曲鼓舞下，大学慢慢撤退到了中国的边远地区。

聂耳？……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于是发生了思想斗争。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的歌曲服务于中国的建设事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了最早的爱国歌唱团的组建工作。但是这一切，无论其伟大的意义还是他实践的生动艺术，都不能说明他